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下）	刘祖平
【读史笔记】	历史的求索——《抢救记忆》阅读随想	黄虹坚
【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6月—1968年8月（二）	樊能廷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下）

· 刘祖平 ·

（上接 z k 1 6 1 0 d）

五，我挨整的经过

回过头来，从我被揪出来那一天说起。几天前我本来得到了“预警”，曾发起批判李雪峰联络站的同班同学纪世瀛不久前在科大发起组织“促进大联合联络站”，很快成为东延两社之后的第三大群众组织及军工宣队的依靠对象，在食堂吃饭时我听见纪在邻桌说，“咱们班要出大事了，有人的问题比吴庭芳（参见前文）还严重，”我闻声望去，发现纪也瞟了我一眼。这叫做给我“通风报信”，是有风险的。我在这之后再次检查了自己的“坚壁清野”是否彻底。但真到那天，一个有点可笑的偶然因素让我猝不及防，军工宣队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宣称有个学生思想反动，他的父亲还是国民党军的上校，正在想这肯定与我无关，今天又躲过去了，没想到“啪”的一声，我已被架着胳膊押上台去，心里还在纳闷。后来才从家里知道，说父亲曾服务于军界是“乌龙”材料，华东水利学院整他时搞错了。

被揪出来之后，宿舍里有文字的东西全被抄走（这倒不怕），人则关进科大“群众专政队”，4，5，6三个系的专政队在教学主楼西侧地下室，有学生（专政队员）日夜值班看守。到了指定的床位，放下铺盖，稍微收拾一下，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了。

当定下“隐蔽身体，发扬火力”的八字方针时，我已把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动定义为战斗。挨整也是战斗，或叫战斗的继续，当然以隐蔽身体为主，首先思想上不能投降。整人者虽然不能称为敌人，但他们都戴着有色而扭曲的眼镜，必将错误地看待和利用我说的一切，我有正当理由不向他们老实交代或检举揭发，不必有理亏的压力或负罪感。

这时候，围绕这场战斗，我认真地想了些问题，如：

1，战斗的意义：前文说过，我不后悔文革中、特别是67年以来所做的事，我相信“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应付挨整的战斗并不影响“时候”何时到来，仅仅影响我将以什么身份看到那“时候”，或者说在等待它时我能做什么。由于家庭出身，反正已是待分配，做科研不必想了，战斗是为了做普通劳动者的权利。

2，争取目标：四清的经验，运动后期处理人的问题有个“宽严大会”，大多数“从宽”，极少数“从严”。我要争取列入可从宽的多数，不必是“最宽”的那一两个，因为他们交代得太多，先把自己放在砧板上，再祈望人家不砍下来，而且对“认罪态度”要求苛刻，恐怕我难以承受；关键是不当从严的典型，不要硬顶，不要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跟人家辩论，不要逞一时之勇，这不是表现我辩才高超或信仰坚定的场合。

3，最不利情况：人家把科大井冈山和我的“三愿”联系起来，同情雄师，干联站保刘达，北大反聂元梓和支持被聂整的人，东社作战部保萧华和同情冲派，不难给我扣上“一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甚至认定我和几个朋友是科大的“黑风源”。

4，有利条件：我在运动中基本是“自由战士”，行踪飘忽，全面了解我的人为数极少。在科大从没参加派性争斗，没整过人，没有仇恨。

5，当务之急：弄清他们已掌握我的什么问题，哪方面的，到何程度？

至于总的应对策略，首先是调动全部智力，保持清醒。从小听惯了别人说我“聪明”，这是考验真聪明还是假聪明的时候，而聪明的高境界是让对手低估自己，自己却丝毫不懈怠。态度要诚恳，似有些惧怕，表示很想老实交代，但有些事记不准确，怕说岔了不好。批判我的话要细听，抓住他们不得不暴露的信息，但注意眼神别“忽然一亮”，让人家窥见我的心机；遇调查者“诈”我时不妨口气较僵硬地表示真想不起什么来，诱使他放出些“弹药”，或看出他无弹可发，我称为“火力侦察”。适度交代问题是从宽的必要条件，问题“性质”要有分寸，事实细节可含糊，用空话“上纲”，检讨尽量沉痛。涉及他人，只说尽人皆知的事，如公开的活动、贴出的大字报等，决不靠检举私下谈话“立功”，哪怕人家再三说“他都交代了，还揭发了你…”，也只回以“他可能记得我说了什么，我真不记得他怎么说的”，交叉揭发是整人者最希望看到的，这种揭发只会使他们对你的兴趣更高，施加的压力更大。真该感谢四清时那些北京东城区的干部，他们告诉我整人都有什么招数，使我能预作防范，战斗中多少能“知己知彼”，一个基本推理是，假如他们掌握的材料已足以（而且证人证言很充分）给你定案，他们不会再花时间跟你磨牙。另有三条我常提醒自己注意的总则，是从某围棋《棋经》上看来的（逍遥无事那阶段我学习下围棋，可惜没学好，但特别喜欢这段话）：“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应对人生各种考验包括挨整，与弈棋相似，这十五字棋经很有用，第一别轻易挑起或迎击并无胜算的交战，第二如果交战，别因误算而失利，第三就算一时失利，更不要心慌意乱，导致一败涂地。

该说到我怎么建立对外联系了。观察了两三天，我发现有机可乘：机会因素一，似因冬季水管受冻（那年头煤产量不高，暖气不足），教学主楼的厕所只能小解，大解必须到别的楼，看守一般带我们去10号楼一层公厕解决，而且他的任务只是防止我们逃跑，站在厕所门外等候就行了。因素二，和因历史问题、里通外国问题被审查的干部教师不同，我算有“恶毒攻击”问题的现行犯，严格规定看守不准看我写的交代材料，以免中了反动观点的毒（据说无药可解，所以看守们没人敢违纪），我在纸上写什么完全没人管，写几行就涂掉、团起来扔了也没人管，而且纸张总数并无控制。因素三，一般每天有半天让我们“劳动改造”，到服务楼锅炉房大煤堆去“倒煤”，几个看守管一群人，大白天不太怕专政对象跑了，若要上厕所，自己到附近11号或10号楼一层去，及时回来即可。因素一和二使我能想出并详细写下“联系计

划”，因素三让我能把计划送出去，交给最值得我信赖的朋友、堪称生死之交的倪诗茂。机缘凑巧的是，忘了因为什么，他那时住在11号楼一层某办公室。我推开门，把一张纸交给正一人在室、满脸愕然的诗茂，一言不发，转身便走。桥搭好了。

从这天起，每隔一天（约定，如有突发的必要，也可提前一天）晚上8点左右，诗茂和我在10号楼一层公厕相会。他先去，我按时到来（人出恭时间基本固定不是毛病），看守在门外，我打开小隔离间的门，见有人，再开隔壁的门并进去（这也不是毛病），蹲下来，确信无危险之后，从隔板下方与他交换一张纸（即使看守进了厕所，也看不到），我问些问题，他告诉我（上次我问以后）他了解的情况，看完立即撕碎，从下水道冲走，然后一般我先离开。

这样联系了两次，我就得到了最想收到的消息。我的问题在科大是“个案”，科大井冈山的以及干联站的、东社作战部的、齐卫东的朋友无一人受牵连而也被专政，也没人向他们调查我的问题。前面说的“最不利情况”没有发生。事情限于北大井冈山，看来红旗飘的朋友受到的压力太大，有人被“攻破”了，可能广泛告发以图“将功折罪”，可能把我说成某些观点的源头，想稍减轻自己的罪责。总之，战斗的情势相对单纯。那时，专政对象也在学生食堂用餐，由看守监督着，和普通学生一起排队，这天我看到机会，稍调整一下步伐，正好排在许小昆（655学生，齐卫东的核心成员）身后，一面跟着打饭的队伍缓缓移动，一面轻声哼着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著名唱段：“王连举他和我单线联系，因此上不怕他乱咬乱攀”，这两句连唱两遍。我“出来”后询问，许说他听懂了我传递的信息。

最终我知道，我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具体说是“攻击”林彪和江青，基本源于1967年7到10月与北大井冈山的若干人一起分析运动形势时我的言论，幸运的是没有涉及关于毛泽东的尖端思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到底谁揭发了我。关于林彪，最有恶意的话是“林彪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其实这么直白的话我肯定没说过，我只是根据军史知识讲述林与不同干部曾有或没有的上下级关系，至多暗示这种关系很重要，所以这话是听者的意会而已，麻烦在于如此意会的恐不止一两人；我的辩解是这非我原话，也非我原意，我只是试图理解林副统帅的意图，猜测军内运动的走向，因为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理解出现偏差，造成恶劣影响。关于江青的话是“江青也不高明”，场合是江当面批牛辉林“不高明”后一群人的议论，有人（我？）说牛“你也别委屈，你是不太高明，王力、关锋出事你就没预见到嘛”，有人接着说“那江青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她就预见到了？”话赶话，所谓江青也不高明成了一个推论；辩解是这番议论确实有，记不清这句话我是否说过，检讨重点是对江的阶级感情不深。总之，这两条主要罪名，我估计对手掌握的证据较“硬”，我都没“抗拒”，而是“有条件认罪”，希望有利于从宽。同样为了从宽，在专案组要求下，我写了不少材料交代与北大的人还议论过哪些事件，我都说了什么，虽然我注意分寸，当时应不犯大忌，事后觉得这有点不智，过于软弱，可能给将来埋下祸端。

有些事是不能承认或哪怕含糊接受的，那只好“战”了，并力争“不败”。一例是，北大的大好形势转入“低潮”时我们多人同去郊游，我曾借辛弃疾的词《摸鱼儿》抒发深感失落的心情：“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当时颇得共鸣。关键是词中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专案组荒唐地指责这是影射江青。我坚称，下半阙中词人自拟为宫中怨妇，“玉环飞燕”代指与作者相似、曾经荣光而风头不再的人，当然不是女性；我向北大井冈山诸人引述此词，相当于我们以辛弃疾自比，“玉环飞燕”及词中其他人、事不必皆有对现实生活的影射，即使有，影射的也是与井冈山相似的群众组织人物；假如当时听我诵读此词的真有人认为我是指江青（他们如此强调），只说明该人“望文生义”，其古典诗词素养太差。争辩当时无结果，我始终不认罪，并注意到对方（很多是624同学）除了个别人在胡搅蛮缠，多数已露出索然无味的表情。后来此罪状不再提起，这一战我胜了。

另一战例更有意思。似为查实牛辉林的罪状，有北大人员在场，专案组说我们在王力关锋倒台后议论时政，牛（或别人）曾说“自古伴君如伴虎”。略加思考，我回答说，这话有，但话题不对。那天说到北大将来必走向大联合，有人说可能聂元梓任北大革委会主任，牛辉林当副主任，牛说，我才不干呢，由此才生出“伴君如伴虎，牛若伴聂，恐无好下场”的议论。这话有攻击毛泽东的嫌疑，本是枚重磅炸弹，将“君”指向聂元梓，等于拆掉了它的引信。北大的人由期待到失望，大为不满，硬说“君”就是指中央高层，我也坚持，议论主题是为牛辉林的将来筹划，他与高层有何关系。科大专案人员不很重视此事，似在旁观。到最后，按惯例要我签字，北大的一人竟怫然说，这证词还签它干嘛！我在心中暗笑。

这次在科大被专政不是意外，其时间之短却很意外，只有约15天。12月20日左右，有中央文件下达，中心内容是大学生分配，面向工厂、农村、基层、边疆的“四个面向”似即来自该文件，对犯错误的学生，文件有“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一类的话。专政队开会传达文件的前一天晚上，诗茂已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我，我当晚即将已写而尚未上交的交代材料毁掉，等待形势变化。果然，会上突然宣布为大多数被专政的学生“落实政策”，毕业班的参加分配，命令包括我的几个“态度较好、认识深刻”的人作为“从宽典型”，在随后召开的师生大会上发言。大会后我们就被“解放”，624开了个批判我和欢迎我“改过自新”的会，我算回到本班同学中间了。

政治运动带来的波折给我一个感知同学情谊冷暖的机会。在因待分配尚未离校的30多位624同学中，我永远铭记姚志元、郑乃萱在我归来后与我毫无芥蒂的友情，永远感谢纪世瀛和据说曾为我向工宣队说情的有些人给过我的帮助；因派性摩擦引发对立情绪，那时已无法照一张全体同学离校前的纪念照，感谢东社战斗队的头头，通知我与东社同学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不过坦率地说，有以后在东北挨整的经历对比，整体而言，作为小知识分子的中国大学生这方面比普通工人农民差多了。

与科大井冈山、齐卫东等曾并肩探求真理的朋友“劫后余生”型的会面百感交集，十分温馨。我们都很清醒，危险并未过去，会面是低调的，虽不算“地下活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许多话不可明言。例如，与齐卫东会面时来为我“压惊”的人较多，有些我并不熟悉，有人说曾看到我站在被专政者的队伍里，低着头向前走，面容抑郁，好像很服帖的样子，我并没说他的印象正是我希望得到的效果，只笑了笑，说了两句话，二十个字：“人在矮檐下，岂可不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诗茂在危急时刻义无反顾，挺身救我，有中华文化最可贵的古侠士之风，令我确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感。我们有默契，建立联系的事不宜外泄，将成为两人之间终生的秘密，不但当时如此（因为我被禁闭期间诗茂曾向何毓宁打听一些情况，毓宁猜想他有某一渠道可转告我，我们都坚决否认），而且此后保持多年，甚至校庆时校友聚会，仍完全不提此事，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向忻鼎亮披露这个“狱内外联系”的详情。我想，如果本文还不说，不仅埋没了挚友之义举，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进步也表现得太没信心了。

战斗的结局是我如愿得到中国科技大学正常毕业生的身份。这时分配方案已定，我自然没什么可讨价还价（有的同学的去处比我更偏僻和艰苦，说是政治不可靠的人不宜分往边疆或民族地区），按照要求，于年底前匆忙离京。行前工宣队对我说，整我的“材料不入档案”；我觉得所说属实（材料留在科大），不排除有不良评语，至少写得不算吓人。

先到县组织部报到再由该部派遣，1969年元旦前，我正式分配到吉林省梨树县农机修造厂，该厂生产农机配件，有200多工人，厂址在该县通火车（梨树不通）且工厂较多的郭家店镇。此后约一年半，我难得地“平安无事”，从吉凶未卜的低谷走出，新地方新单位的好

多方面令我喜出望外，周围都是开朗豪爽、眼界相对开阔、对外地人尤其热情友好的东北人，工作中可学习的知识无穷多，让我既有兴趣，也有慢慢丰满羽翼、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用四个字形容那一年半我在农机厂的感觉，那便是：“如鱼得水”，何况是一条曾在干涸的沟渠里挣扎的鱼。

又一次挨整随着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参见“风雨中”）到来，没有预警；后来又随全国“清查516”加码，一度阵势不小。其时间跨度比科大那一次长得多，但强度、危险性和给我的精神压力小得多。有意思的是，我与“整人”路线打交道从同情被整者开始，即使冒风险，也要送出我的同情；到我在郭家店挨整结束，我在这个塞北小镇收获了无法计数、非常暖人心田的同情和爱护。这算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

70年，我突然又被“群众专政”，还是失去自由，这次叫做“进学习班”。周围的人惊讶，我心里有数，“老毛病”又犯了。从“提审”知道，此时已迁往安徽的中科大来过人或调查函，我的“问题”已惊动当地，在这个说县革委会主任或武装部长几句重话就可能有大麻烦的小县里，涉及林彪、江青的案情太吓人了；还知道，齐卫东已被“攻破”，有人揭发了我“出来”后与他们会面时说的“矮檐”、“青山”那两句话。我的回应是：我在文革中确实犯了错误，经过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面旗子举得越高越好）的教育和落实政策，问题已有结论，准予按时分配，材料不入档案，对我的要求是在实践中认真改造思想，与过去的错误决裂，我正是这么做的。对我的说法，提审者似无可辩驳。至于齐卫东出事，详情无从得知，但我并不紧张，在科大与他们的交流不算深入，我最尖端的思想没向他们透露，他们在上海到底做过什么及内部的最尖端观点我也不知道，而那两句话虽然让整人者听着感觉不爽，怎么上纲也算不了多大的事；反过来，这说明我当时的谨慎，尤其是秘密联系没有外泄，是明智的。提审后，那些人不再找我，除了和另几个“学习班学员”关在一起、每天参加些打杂型的劳动之外，没有加压措施；而我的未婚妻、科大井冈山的战友赵婉如从黑龙江调到梨树县来的事（疑因不同部门间沟通不畅）并没因我被关而中止，还在她调来（到郭家店镇淀粉厂上班）后允许她和我见面，当然，少不了有人在场监视。

正在我觉得这次挨整似乎虎头蛇尾时，情况变了。县里派了工作组来抓农机厂的运动，由县工业局、粮食局的两位一把手分别任正副组长，很快向我宣布，我的案子是县委直接抓的全县第一要案，自然是本厂工作重点；要求我老老实实重新交代问题，不得隐瞒。我实在不解，这么折腾我干嘛？这时真后悔上次交代材料写得太多，都写过哪些事、我自己原话是什么，记不清了。稍推托几句，无效，又想两次的交代即使有几处对不上茬，总有理由可说，没什么大不了，为这点麻烦不值得“抗拒”，便不争了。回到“牢房”，很无奈又窝火地花了几天时间，凭回忆大致再写一遍，为充篇幅，空话更多，用现在的话叫“灌水”，记得每写一页，必用一句毛泽东语录和一段堂而皇之的论述引领下文，真正的“问题”多少有所淡化和减轻。写完，交上去了。

然后大张旗鼓地开过对我的两次厂内批判会。第一次会前，厂区的大喇叭在造声势，气氛有些紧张，学习班的看守的头、一位老党员后来告诉我，他曾叮嘱别的看守，万一有“愤怒的群众”冲上来动手动脚，一定要保护我别被打伤。开会了，我低头站在台上，领导讲话，几个事先准备的发言，口径都是斥责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却无具体内容，显然还是因为不敢触犯“反动言论不可扩散”的禁令，或者说我又沾了这条禁令的光，听众没有受到刺激，不会有多大的反响。稍微冷场一会儿，忽然有人找到新话题，带头揭发我来厂后“伪装进步”，于是不少人跟上，举出许多事实，集中揭发我、或不如说表扬我如何“伪装工作积极”和“伪装团结群众”，比如有人说我经常延迟下班，有人补充道还不止此，某次因为什么我曾连续工作24小时。也许有的人只是为发言而发言，但我从过去关系好的有些师傅此刻的眼神知道，他们是故意乘此机会为我说好话，希望我将受的处罚或许减轻一点。会场的气氛变了。

第二次批判会基本上整个变成这种变相评功摆好会，发言的人更多，与我很熟或不太熟的都有，似乎若知道我某个优点或得到过我某种帮助（比如我回南方探亲时为他在北京、南京代买过东西），一定该在这个会上说一下。会后，工作组的态度也有微妙变化。一天晚上，工业局李吉昌局长（一位颇有威望的老干部）到牢房来，我正在写希望维持工宣队原处理意见的申诉信，一面抽着两毛钱一盒的“蝶花”牌香烟。他问了问旁边的人，确认我的工资（每月53·5元，那时对单身的人不算少）照发以后，扳着脸对我说：“少抽点烟，实在要抽，买好一点的，别舍不得花钱！”

批判会不再开了，慢慢地又让我参加打杂型劳动，仍无自由，看管越来越松。71年夏，放出学习班，回原车间工作（车间主任要求的，我是生产线上一道关键工序的高产纪录保持者），但向我宣布一条纪律，不得擅自离开本县。我要求审查结论，答曰梨树县做不了，正与科大联系。同年约11月9·13林彪事件向下传达（我与赵婉如曾买一瓶红葡萄酒庆祝）后，实际已无人管我。直到刘达在合肥复职，72年，科大派党办干部、以前的645学生司有和到东北为多名仍因运动中的“问题”被纠缠的毕业生解困，到梨树县时帮组织部门做了一份官方和我都能接受的结论。我的挨整经历方告正式了结。

一位参加专案的人后来对我说，他佩服我“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并告诉我两件事：一，我在科大的所有材料，被梨树县派去取的人在归途稀里糊涂弄丢了（原来如此！），所以目前我的材料只剩刚写的、并无旁证的这套“孤本”；二，当初重视我的案子，是因为有个神秘人（自称是科大的？）参加过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等“正版516小集团”活动，至今无下落，曾疑是我，所以案件为“中央督办”，经初步查证，已排除。对第二点，尤其那人后来找到没有，到底是谁，我一直很好奇。说实在话，此人在文革中活动的风格与我真有些相似，他长得大概也有几分像我，不过我确实从没去过钢院，更绝不可能参加“516”炮打周总理的恶行，我早已视总理为中国政坛理性尚存的象征和未来走向正轨的希望。

总体上，郭家店永远是我美好的记忆，我看到了国人善良宽厚的一面。说来惭愧，与这段挨整不无关系，在郭家店的几年，只要我有难处开口求人，总得到格外热情、毫不讲条件的帮助，有时还加上一句：“那时候我想帮你的忙也帮不上，这件事就交给我好了，你放心，”我一直享有厂里极好的人缘和局、厂领导的好感。1980年前后，张贤亮原创、谢晋执导的电影《牧马人》感动全国，朱时茂饰演的男主角划成右派后到荒凉的大西北牧场劳改，周围朴实的民众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温暖。电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在那个东北的小工厂里，久经沧桑的师傅也好，涉世未深的徒工（我被禁闭时，有两位“楞头青”型小伙子先后偷偷对我说，愿帮我给“赵姐”“送信”，我当然都谢绝了）也好，把我的遭遇看作“好人落难”，给我那么多同情和爱护，有的语言都和《牧马人》的台词相似。我对生活在基层的中国老百姓怀有感恩之心。多位也是刚分配来厂的大学生与我的友谊则有“同是天涯沦落人”和“相知贵知心”的味道，同样令人感动和难忘。

回顾在东北挨整的经历，当然还应感谢我的前妻赵婉如，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我们1972年3月结婚，73年春节夫妻同享受县工业局（因为我婚前申请探亲未被批准，在李局长许诺并安排下）“还给我们”的探亲假到南方，顺路到合肥看望了刘达同志。虽然在多年后产生分歧，我们两人终于各奔前程，我对她始终抱有最善意的祝愿。

卸下政治包袱，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在郭家店剩下的日子平凡、愉快，也怀有希望。因为落实相关政策成为技术员，随着工厂产品升级、规模扩大曾几次出差学习，后来被派到另一个厂负责技术改造，多少算受到“重用”，虽然格局不大，虽然当年科技强国的抱负和“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遗憾还在心底深处燃烧。旧习难改，我们仍然密切关注政局的动态，虽

然扭转“极左”倾向的期望一次次被毛泽东顽固地以“继续批右”的浊水浇灭，我们看到了令人鼓舞的积极趋势——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阶层，对文革那一套的厌倦与反感在一次次反复中走向一致，在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和随后对镇压的抵制中公开表现出来。尽管出言仍须谨慎，尽管可能只是萍水相逢，对时局看法相似的人到处都是，与文革中曾属于哪派无关。挡在这洪流前面的，只有毛泽东和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一小撮”，而毛在林彪事件的强烈精神打击（毕竟，这是他在党内占领导地位后唯一的一次，整倒对手后才得知他亲自封的这位“亲密战友”真的在算计他）后健康迅速恶化、呈“日薄西山”之老态已是遮掩不了的秘密。中国在等待的，只是在他身后，出现一位或几位真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训的人物，即使毛泽东挑选他们走上高层时曾费尽心机。

毛泽东离世和四人帮垮台改变了无数人生活的轨迹。1977年12月，与我来到东北相同的季节，我们调回科大。我很快就投入了筹建我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要充实自己，又要以世界水平为目标奋斗攻关，一个字：忙。“残梦十冬未忍抛，请缨谁料许今朝”（我的两句诗），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心情舒畅。

我记不准彻底平反、清理档案是哪年，也记不准清出来的东西上写了些什么。与正在忙的事相比，过去那点挫折和伤痛，不重要了。

六，小结和一些思考

对文革经历的小结，应该放在对迄今为止一生的全面小结，乃至对整个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发展史的回顾的大框架下。还是应该以本文第一章，我的前辈和他们那一两代人曾为之心系魂牵、咬牙苦斗的梦想为起点，看过来。

不要说百年前，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也没几个人能想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今天能走到这样的程度。中国人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走过的路并不平坦。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人民为国家繁荣富强付出了重大惨痛的牺牲，包括文革的磨难。

我喜欢用“生逢鸿变世”形容我们成长的时代，鸿变是巨大的正面变化，不说“乱世”，也不简单地说是“盛世”。因为鸿变，我们在变化前吃过后人吃不到的苦，变化后更体会到后人不易感受的甜，这是一种幸运。更幸运的是，我们不是鸿变的旁观者或单纯的受益者。假如在梦中见到逝去多年的前辈，或面对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问，中国发生鸿变的这些年，你在干什么？我能坦然地说，在我的岗位上，尽绵薄之力，我做了点有意义的事。为了这个回答，有过的坎坷和艰辛，都是值得的。我在前言里说的“无怨无悔”，是我到退休年龄时对生命历程的小结的一个侧面，当然涵盖了文革十年，包括挨整前后。

文革是我们风华正茂的大学时期忽然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没人知道它将把国家引向何方，每个人必须自行选择该做什么。虽然受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严酷限制，凡事务必谨慎，我的选择让自己无怨无悔，可以用这十个字小结：“曾尽匹夫责，不负少年时”。

再谈几点读“风雨中”和回忆文革之后的思考吧。

1，我们当学生时，接受了许多政治教条的灌输；现在常看到，许多很讨厌教条的人，却难改换由灌输而成的习惯思维方式。一个例子是看是否符合马克思或什么人在某经典里说的话来判断观点的正确性，或发动批评，比如“风雨中”作者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批判。参加四清给我的一大收获是，判断某人或他的思想是否伟大，是否值得紧

跟，不能只看文字，只考究他的话是否符合某种教义，要看实践效果，看亿万普通老百姓的感受遭遇。顺便说，我一直觉得“两论”并不是毛的行文风格，所以相信一种说法，它们是别人（艾思奇，可能还有张闻天？）撰写的哲学课讲义，毛只是讲课时使用过，后来经胡乔木在文字上把关和润色，收入《毛选》以加重毛思想的理论份量。

2，第二个例子是总觉得“改良不如革命”，若对一些现象不满，则其根子是什么什么，非有个“革命”性变动不可，做别的努力都是“改良主义”，修修补补，不解决问题。大谬。社会的进步都是在改良中取得的，也许缓慢，但是坚实，与人的观念同步前进，才是真的进步，不会因“城头变幻大王旗”倒退。有时阻力太大，实在改不成，只好革命，这是革命的意义；革完了，能改了，还是要逐步改。革命不仅产生破坏，死人，还有后遗症（如加深了人群中的裂痕，产生了一批“功臣”），而且社会与民众观念其实还在原地，不可逆转的进步尚未发生。回顾中国近代史，若非满清贵族昏聩到极点，改良主义、君主立宪未必不可行；曾想辅佐清皇室或袁世凯或黎元洪或蒋介石治国的人士，不都是坏人。

今天的中国走在基本正确的道路上。与文革结束时相比，伟大成就不仅表现于国力、GDP、经济基础和居民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还有教育普及、法治、人权和民众的许多观念的进步，这些成就来自近四十年的改良。

3，维护国家稳定是改良的最重要的条件。内外因素决定，两党制、国家领导人自由竞选、直接选举等等不适合于今天的中国，那是致乱取败之道。

所谓内部因素，主要指中国人习惯的思想认同和道德取向，讲忠义，而不讲人人应独立思考、“择善而从”；讲抗争，而不讲“承认这次失败，下次再来”；还有家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一旦直选，不论谁赢谁输，必定两派对立，无止无休，从“无理搅三分”到不惜动武，最坏便是内战。文革中这一幕曾频频上演，台湾亦有此病的痕迹。观念当然可以改进，但需要时间，要从基层农村街道选举做起，慢慢培养民主习惯。就算回忆文革应汲取的一条教训吧，仅看内部因素，轻率直选犹如放猛兽出笼，后果难以预料。

所谓外部因素，主要指外国必定干涉，所用招数已屡见不鲜，花钱扶植反对派（尽管在本国，竞选者接受外国资金绝对非法），没事造事（不只是“找事”，包括用狙击手制造流血），颜色革命，西方媒体拉偏架，舆论一边倒，其他制裁、恫吓、许诺援助（一般不兑现）等手段跟进，直到当事国内乱，他们坐收渔利。期望外国势力如君子般行事是不现实的，以美国为例，总有些政客对中国走向富强怀有永恒的戒心与敌意，一旦碰上不如意的事，第一反应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相信的逻辑是，你居然发展比我还快，那…要么你如昙花一现，将很快崩溃，要么你的办法邪恶（破坏环境、挥霍资源，剥夺人权，或造成人民生活困苦），要么你一定偷了我的技术机密（所以这类案子层出不穷）…他们决不肯承认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中国治国之道有可供学习的长处。每当我们国力稍有增强，他们就说你“打破平衡”了，让他们不安心，不舒服，好像中国任人宰割杀掠、“豺狼来了”也没有“猎枪”的年代他们曾觉得很平衡，很舒服。对曾经对手，就算完全接受他们的政治制度，如南斯拉夫和俄罗斯，他们仍不会拿你当“自己人”，必搞乱你、削弱你、围堵你、分裂你、把你整趴下而后快，认为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仅看外部因素，轻率直选叫做“太阿之剑，以柄授人”。俄国人够强的定力，目前为止抗住了，中国行吗？

有人说民主程度总归高一点好，有点像当年毛式思维推进农业改造，“一大二公”，公有制成分总归高一点好。不顾客观实际，只用一把尺度量，算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吧。

4，“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先生的至理名言，值得对现状不满的仁兄们借鉴。研究问题是社会愿意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解决问题是标志社会实际进步的刻度。

涉及主义，“不争论”有时是上策。要是邓小平等争论清楚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再决策，到他去世大概还没争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务实精神的旗帜，“与时俱进”这口号也有大智慧，两种提法的功能都是避免争论，为“研究问题”松绑。请设想，同样的话题，如果以“某某主义或思想已经过时”开篇，没等你讲完就吵起来了，但“与时俱进”，至少可以讲下去。我第一次听到这四个字，就觉得它有与“替天行道”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换个说法，却成功地减小了人们条件反射型的反对声。

同理，若有人提出要批判毛的“区分两类矛盾”论，必定争论不休，旷日无功；但近年的法制建设，具体问题逐个解决，陈年冤假错案获昭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利得保障，已达到很好的效果和人民的认可，还在继续前进。先辩清理论、后研究实际问题的思路至少有些不智，不对吗？又如，若你觉得西方或某国解决某问题的办法好，值得学，具体介绍它就是了，确实好有可能采用。假如先戴个“全盘某化”的大帽子，不是挑争论吗？

为了不争论，有时舆论自由要付点代价。你说，人家也说，就是争论了。当然，这种限制应该只针对“谈主义”，“研究问题”是无禁区的，每个人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5，对于中国近年的多位领导人，虽然都可以批评甚至指责，我基本持赞赏态度，就大局观之，做到这一步，不容易。这些人入选其位，我为国家庆幸。

从邓小平说起。经过文革“横扫”式的大面积恶整和反复，那么多老资格的中共高干或死或臭或元气大伤，虽“几起几落”而保存下来并且威望最高、能统率全局的一人，恰恰是既有眼光、也有魄力实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不能不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幸运。要不是邓，恐怕连“恢复高考”这道小题目都得拖泥带水地做两三年，别的就不必说了。邓有他的大功劳，也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将受到历史和后人的评判。传闻73年邓刚获准重新工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现在对你三七开（指‘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不错了，我将来能不能三七开还不一定。”这话也许是编的，但我觉得像毛说话的风格和他当时的心态，而且真有点“一语泄露天机”、多年后应验的味道。

顺便说个看法。一讲到邓小平，很多人会轻佻地提起他曾向毛保证“永不翻案”，似乎是他的权宜之计，或干脆说是骗术。这错看他了。邓的不翻案有明确的界定，指他在67年向中央写的检讨，邓承认文革初派工作组搞运动是错误的，还涉及以前有几件事没向毛汇报或执行毛的指示不力，我们见过传抄件。他以后没有翻案。任何情况下，包括他一言九鼎时，邓小平从来没说“我是在压力下违心做的检查”，没说派工作组不是错误。但是，承认我错了，并不自动表明你撤掉我的职之后做什么都对，不认可你正确不是翻案。事实上，毛后来下决心批邓、罢邓，正是因为邓虽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反复催逼，仍坚持不肯说那几年文革搞得“就是好”，降格到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也行，还是不说，只用他呆在江西，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来搪塞。为此邓不惜再次被打倒，也不惜在华国锋当政时推迟再出山，表明邓的原则性。在这个问题上，邓是无愧的。

穿过重重险境而保存下来的还有朱镕基。朱主管经济几年，中国经济步入稳定高速发展的正轨，摆脱了原先忽热忽冷的“打摆子”模式（热则百业亢进，通货膨胀吓死人，冷则到处下马，一片萧条，似源于邓系和陈云系两派经济观点的拉锯战）。传说朱年青时几次因言论太“右”险遭不测（看他的才气和性格，似可信），都被“爱才”的领导保护下来，不然他哪有为国家“闯地雷阵”的机会。这是中国人民之福。朱的一些具体举措（如某项目暂缓上马）今

天会有人批评，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宏观把控绝对是正确和必要的。朱镕基经济政策成功当然离不开江泽民的信任和支持，江在政治上树起“与时俱进”实行改革的旗帜，阻挡住和化解了来自内部的很大的阻力，虽然有些化解之道有后遗症，比如让许多高干子弟下海经商，其中很多人利用“双轨制”等政策漏洞大肆渔利。

胡锦涛、温家宝比我们“老五届”大学生稍年长，很多方面与我们相似，可以想见，他们文革前都曾品学兼优，壮志凌云，文革中从力图紧跟到迷茫和无奈，然后到最基层，与普通百姓朝夕相处，同时力争有所作为。假如76年“天安门事件”前后遇见他们，相信有许多共同语言。文革结束后，他们都是最热情的改革家胡耀邦看中并带出来的政坛新人。无怪乎他们执政的十年，除了经济维持高增长外，胡、温的领导风格稳健、包容、亲民，在“非典”猖獗、汶川地震等严峻考验来临时敢迎难而上，并不失时机地强调（作为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补充），发展必须有科学性。他们还及时清除了薄熙来这个言论行事带有“联动红卫兵”色彩、对国家政治走向形成潜在威胁的病变细胞。

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比我们年青，学业遭文革打断，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人生。我认识不少这个年龄段的知青朋友。与胡、温相似，习、李得到了后世极难得的深入接触社会底层，并在前路茫茫时不甘沉沦、脱颖而出的机会（这可不是所谓内定提拔、下放锻炼）。更难得的是习近平的“红与黑”双重家庭出身，幼年时，父亲就横遭不公正的对待，他没有机会染上某些高干子弟的流行病，却在逆境锤炼和人民的呵护下继承了父亲的品格，而且不管打掉多少大贪巨腐，他对中共的感情无人可以置疑。他最终走上今天的位置，因素当然很多，但我不能不庆幸，类似背景和经历的人以后不会再有了。

有人说，不管选了谁，中国的领导人选拔制度不好。从另一个角度说，不管设计了好多的制度，未必能保证选拔得人。在美国生活过，我知道一心只想多得选票的执政者行事未必合理，正如一心只为高收视率而制作的电视节目未必好看，更未必是精品。

为了完整，行文至此，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代”最重要、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两位领导人毛和周再说几句话，尽管我的看法前文差不多表达过了。我不尝试做所谓科学的全面评价，不分析客观因素，而偏重（我相信的）主观层面。

我同意一种说法，假如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退休或辞世，他应是中华民族彪炳千秋的大伟人。可惜不是这样。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加59年反右倾和随后的大饥荒，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多少有些在前为因、在后为果，三场大灾难严重毁伤了我们民族的根基和精英，直接受害者至少数以百万计。若还硬把对毛泽东的评价抬到天上，无疑在撕裂民族的感情；对已发生的事实加以掩盖或粉饰，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有人强调认识上存在许多客观限制因素，或者毛不该算唯一责任人，我只想说两点：一，1949年以前，关于建国和施政的设想，毛说过许多很正确、很好听的话，有些还写在《共同纲领》里，有的反映在党的文件里，假如这些话得到稍有点真诚的尊重，三场大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或避免。毛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不断撕破脸皮、推翻承诺、将不赞成这么做的昔日战友斥为“资产阶级代言人”或“走资派”严加打击的理论。期待一个人说过的话“算话”，哪怕是不太情愿的表面上的维持，不该算过分的要求。二，特别对后两场灾难，三年饥荒和十年浩劫，如前文所述，毛是知道自己的主张的恶果的，并且为此惴惴不安；他却坚持不改，对曾劝诫他或敢说几句真话的党内同志加重打击，使国家在灾难中越陷越深，这种情况下，一大批附和他的论调、帮他掩盖真相的人是他制造出来的，不能减轻他的责任。这不能称为“好心办坏事”，客观效果与他的主观动机有内在联系。毛泽东主席有他的历史功绩，但是人品有严重瑕疵，他对不起曾对他“无限热爱、无限信仰”的亿万中国人民。

与此对比，我们这一代人对周恩来有深厚的敬爱之情。本文也不展开来讨论，只针对性地说两点。一，有人说周对毛是“愚忠”，是封建道德，这种贴标签式的批评完全不顾周多年的革命生涯，纯属想当然。周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进入中共高层、参与军事调度指挥比毛早得多，在战役战术层面，周总是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但苦于找不到正确的战略方向，从南昌起义到与李立三、王明博古、共产国际或其委派的专家共事，逃不脱屡战屡败；遵义会议，毛参加军委三人领导小组以后，情况根本性改观，不仅当时跳出险境，而且从胜利走向胜利。文革初期，我在中科院亲耳听到过周的讲话，与林彪等人动不动自吹“一贯紧跟、一贯正确”不同，周说自己犯过“追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后来幸亏“毛主席拨正航向，挽救了中国革命”，态度坦率真诚，令人感动。以周的智慧，他深知自己长于具体部署、细节筹划而弱于战略决策，所以从那时以后，尽管有过疑惑，有过委屈，他在大方向上唯毛的马首是瞻，相信这有利于他热爱并决心为之献身的事业。这是种“思维定势”，或可批评为“迷信”，但与封建文人对“主公”的依附不是一回事。二，有人说，1967年初，当渐渐觉察到文革运动有点“不大对劲”的时候，周有多项选择：与几位老帅一起直言抗争，或拂袖而去，或称病不出，或消极怠工……也许不至于使自己的名字与那场浩劫联系得如此紧密，比如被指派为某些“专案组”的组长。平心而论，这些选项都有合理性，但周最终选的是忍辱负重，是不与毛在大问题上正面冲突，是积极发挥作用，是尽最大可能减小运动的破坏性。不管当初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我只能说，对他本人，这个选项最艰辛，最劳累，有最多的危险，他的寿命因此缩短；而对我们民族，这个选项是最有利的，不仅当时国民经济没有崩溃，民生领域没有形成严重的“次生灾害”，而且拨乱反正之后，各行各业要起飞，还有虽薄弱但基本配套的基础，还有虽受打击但大部保留的人才（有的没能保住）。1976年清明节，中国人民用史诗般的集体英雄行为表达了对周总理所做选择的感恩，同时点燃了国家凤凰涅槃的希望。周恩来总理的形象和天安门广场上那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幕，将永远存活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

说来有些怪，文革时期，批评当局和最高领导人有生命危险，如本文所述，我是个勇敢但知道自我保护的尖锐批评者；此后直到九十年代初，我也常发出这种批评，伴以该如何治国的种种意见，有点像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今天，当这种批评很安全、甚至颇“时尚”的时候，我却变得很少附和别人的批评，往往还为当局辩护。也许是有点“既得利益”，也许是暮气随年龄增长，我自己认为，第一是因为宏观上满意国家这些年的施政成就，综合国力不必说了，说人民生活吧，记得我80年代出国时，得到许多外国友人多少夹杂着同情的善待，既感谢也惭愧，谁能想到，现在这么多普通中国人在国外竟以“购买力超强”出名（与他们比，我不算“有钱人”）；第二是因为一直想做事，也在单位负过点责，我知道把计划的好事做成做好，很不容易的。极言之，假如三十年前真把国家权力交给“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做不到这样。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万事大吉，问题、毛病、让人不满意或有待改进的事多得很。就说中国人出国吧，钱是有了，关于文明素质的爆料却常令人赧颜，确实好多工作该做，然而说到底，这与来自战乱国家、在外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难民不是一个类型的问题。还有人觉得维护国家稳定不重要吗？

记得59年反右倾刚开始时，报刊曾登载（后来听说是康生组织的）大块文章，指责彭德怀元帅不是革命家，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好像一戴上这顶帽子，彭元帅几十年金戈铁马、卫国安民的百战功勋就可以一笔勾销了。还是中学生的我总觉得心里有个疙瘩，就算是“同路人”吧，曾经同舟共济，同越激流险滩，甚至曾奋不顾身，力挽狂澜，有什么不好吗？当你扩大革命阵营、呼吁加强团结的时候，打算过胜利后把“同路人”清除掉吗？这顶帽子当然是对革命家彭元帅的诬蔑，但这个词一直留在我心里，而且不是贬义。在我看来，许多我毕生敬重和友爱的人（包括我的祖父和外公），若不是共产党员，就是或最终是中共的同路人。回顾过往，文革之后我个人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做成并引以自豪的事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共的事业的一部分，也算和中共在同一条路上走到今天，或者用身居宝岛台湾的自由战士李敖先生

的成语新解，这些年来我基本上“休戚与共”——“休戚”仍指喜悦和忧愁，“共”变为名词，“与”则解为“和…一样”。

这条路很宽，也很长，文革是我们身后曾走过的一段低暗的旅程，2021年和2049年两个“一百年梦想”实现的日子是前面高处依稀可见的两座里程碑。

1976年底，我在郭家店写过一首长诗，写阅读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和回味文革十年动荡的感想，或者说在文革终于落幕之际，面对浩瀚的历史，记下一个爱读史书的理工科学生的心声。本文的题目是文革经历，就用那首诗中的几段收束全篇吧：

……忆昔曾过黄河岸，水下千崖天地颤。壮气喷薄似当年，群雄跃马各争先。……
群雄灿灿今安在？风卷浊流声澎湃。群雄事业青史中，群雄名姓青史外。……
休言善恶必有报。英雄遭遇或可悲。尝为国家筹百策，一身未辨几安危。奔波奋战何所有？肯效诸公拥轻肥！……
休言善恶能无报！千秋爱憎尽是谁？东洲争道神京美，英雄功业口皆碑。精神永在高何拟？万古凌霄振羽飞。岂如狗苟蝇营者，惨淡钻爬赖鼓吹，有朝叶落疾风扫，满天仇恨自栽培！……
古来二事君勿疑，青史民心不可欺。民心恰似火山浆，默默之时任主张，一旦洪流愤然起，地裂天倾谁敢当。民口一如黄河涛，疏之渐平堵愈高，君不见决堤狂啸日，巨石亦作鹅毛飘。……
寄言后世著书者，千古文章在今朝。雄词俊笔托君手，奇志丰功见我曹。青史敢向前贤比，江山留与后人骄。水流千里归大海，一江雪浪乐滔滔！”

2016年9月，于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

~~~~~  
【读史笔记】

历史的求索——《抢救记忆》阅读随想

• 黄虹坚 •

这篇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一是冲着和王复兴几十年的交情，在老朋友的层面我义不容辞。二十啷当岁时，我和复兴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文革”中有过较密切的交往，有的观点和看法在当时也比较接近。他在《抢救记忆》书中写到的一些事，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

二是我自己对文革也有话想说。我们的青春在最重要的和本该最灿烂绽放的时代，和中国一起，蒙受了一段历史黑色岁月。这长达十年的磨难，在中国的每个家庭、每个人身心上都刻下了程度不同的烙印，它影响了并还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我们在社会当下的种种行为中，看到了文革遗风。文革就好比是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的盒子，释放了人性的黑暗阴晦与某些落后丑陋的民族性，而且再难把它们收归盒中。说文革遗毒已清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中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文革旧账是非要时时清算不可的。虽然文革已被宣布结束五十年，但它还在社会生活中像幽魂般徘徊，成为了社会的毒瘤甚至是癌症。

北京大学是中国文革的源头，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命运的序幕，就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拉开的。这幕为何选在北大开演，北大又经历了哪些文革阶段？许多北大人都会提笔写过，文章也见过不少。每个人对那段日子的记忆方式不同，每个人也仅能经历他所能经历的历史一隅，也都只是各人的文革印象。但从各角度提供的历史片断，将会拼构成完整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帮助人们正视北大的文革史，也正视中国历史中难以翻篇的重要一章。

北大文革史无疑是中国文革史的一个缩影。

最重要的知情者，我认为还是聂元梓及比较接近她的一些人。这些人若秉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就须有对历史见微知着的眼光，还原历史真相的勇气，自我剖析的觉悟。作为史料，一切的基础必须是：真实，然后才谈得上数据的分析与观点的确立。

聂元梓对北大文革的回忆，她身边种种人士对文革的回忆，不少已通过海内外正式、更多是非正式的渠道出版了。复兴的《抢救记忆》不是第一本也不会是最后一本相关书籍，但这本书仍是不可替代的。原因是复兴当时不但是北大文革一些重要事件的发起人之一（如“红旗兵团”和“66”串联会），还参与过北大文革一些核心事件（如与聂元梓一起去见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又如见过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而且他与北大上下各层人物都有来往。他虽然低调但是活跃，忆述的一些活动及聂元梓的真实想法，以及不限于北大的北京市文革史实，许多是人们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

我认为这是这册书最重要的价值。

至今我仍记得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我们正在北京长沟峪煤矿与矿工相结合，共同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二日早上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文系召令我们回校。在南校门我在敞篷卡车上见到了欢迎的人群和狂热的场面，顿时被感染得异常亢奋，同时内心也充满了不安、疑惑甚至是恐惧。那种情绪的记忆是真实的。但职业令我已把“文革”幻化成一种文学创作，有时会分不清真实和虚构的情节。现实更需要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提供冷静的、严谨的细节，让人们认识到那一场拿国家和人民命运作政治实验的高层斗争，是如何通过北大文革一个个阶段反映出来的。

复兴充当了其中一个亲历的角色。他把书定名为《抢救记忆》，“抢救”一词便体现出深挖往事的迫切性，同时也表现出他投身其中的责任感。为了避免记忆的错误，为了求证每个细节，我知道这几年他不断地往返美国和中国，放弃了悠闲养生、含饴弄孙的闲淡生活，自讨苦吃，自我折磨，才有了这么一本我认为是值得一读的书稿。

这册书的内容不限于北大的文革，也记录了复兴家庭的故事。他祖父被囚，父亲挨斗，至亲弟弟被残害……尊严曾那样地不值一文，生命曾那样地被无情践踏，今天谈论已匪夷所思，但读来仍叫人惊心、愤怒和思绪难平。我父母在“文革”中也曾被抄家、被审查、被批判、被关闭，当时家人天各一方，音信隔绝。读到复兴书中内容类似的章节，常常感同身受。他一家的经历也是中国其时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某程度上，它也是一部家庭的文化史。

《抢救记忆》也花了不少笔墨写到复兴自中学起受到的各种“革命”思想影响、成长经历及“文革”中的种种思考，其中有自我检视，也有他到美国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后对事物进一步的思考。在这角度上说，《抢救记忆》也是他个人的思想成长史。

当然，由于事隔久远，由于观点与角度不同，也由于记忆可能有误，该书对北大文革事实的忆述或会与一些人不同，据我知有的北大当事者就对他描述的事实持反对的意见，但我目前选择相信复兴的版本。说来有几点理由。理由一，复兴就读过北京男四中，从很年青时起就对政治有较深入的观察和关注。如今提起男四中，名字仍振聋发聩。它一直是中国的贵族学校，集合了中国最高层的权贵子弟，那种自以为是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培养，复兴已通过书的第一章作了记述。在这种氛围中，复兴自然也会受到强烈的耳濡目染，对政治产生兴趣。我初到北大时就已从身边一些北京名校生的身上验证了这点。他（她）们虽是平民出身，但受到学校高干子女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管，谁管？”的气势感染，谈论起政事张口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全然是政治局委员互称的口吻，着实把我们这些只敢尊称“刘主席”、“周总理”的人吓一大跳。因此我从不怀疑复兴对政治的敏感和热心。

顺便要说点丧气话，这就有点自作多情了吧？以复兴的“右派”子弟出身，那个“天下”能是你操心的？最多也只能是个陪跑的罢了。用今天的网语说，就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理由二，复兴是学历史的。这个学科要求的是缜密的思维和求证的认真。这正如中文系的学生通常都有点小资浪漫一样，复兴也具备了历史学系学生的特点：认真、踏实。

理由三，据我对复兴的了解，他有着拼搏及钻研的劲头。这可能来自于他年轻时对体育运动的痴迷（他曾是北京游泳代表队的运动员），对认定的目标咬定不放松，老了更把这点发挥到极致了。听他也听别人说过，为了回忆某个细节，他常常失眠，又或者苦苦推敲，又或者找人探访求证。

基于这三点，我对复兴书所记录的内容投信任票。

只要血还未冷，经历了，我们就有责任了。我们的责任就是留下自己用眼睛看到的细节，留下自己用感情感受过的岁月印记，让世人特别是年青人通过不同的历史角度去建构完整的文革概念，共同阻止文革在中国再现，共同抵制“文革”在中国复辟。复兴努力了。可以想象这二十二万字的书稿是在多少与年老岁月诸种不适、倦怠、失忆的苦斗中完成的。在此我愿意表达对他锲而不舍精神的欣赏，很敬佩运动员出身，北大多项游泳、滑冰、长跑项目冠军的复兴在写书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年青时的顽强和坚毅。我们尽管遭遇了错误和荒谬的文革，但仍保持了值得自豪的品格，因为我们都曾沐浴过北大校园的自由求实之风，我们都曾是北大人。

这册书也必会遇到各种批评和责难，特别是当时持不同观点的对立派朋友的激烈反应。尽管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一起吃喝旅行，但谈到文革时仍还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由此也可见文革令民众的撕裂已达到何等程度！即使是我本人，对他书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也持保留的态度。相信这一切都早在复兴的预料之中，也相信他有接受这一切的准备。言论自由已通过网络风气渐开，有理性的争论是好事。只要认定自己求实求索的初心，复兴就坚持吧，因为我们都曾是文革的见证人。

2016年8月1日香港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

【资料汇编】

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6月—1968年8月（二）

〔编者按：《北京大学纪事》原由文革后的北大校方撰写，其中1966年6月—1968年8月这一时段资料由樊能廷作了扫描、校对、制表，在此供读者参考〕

（上接 z k 1 6 1 0 d）

8月

8月1日 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因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中有功，奉命列席全会。

8月3日 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从7月30日至今日连续三次召开全校大会批斗工作组张承先、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8月3日或4日 江青邀聂元梓坐江的车到她住处（钓鱼台）吃饭，她说聂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的。她向聂透露机密、攻击刘少奇。江要聂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聂事后认为：这是“表明她把我当做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

8月4日 康生、江青在全校大会上，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祝贺”。康生在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六一八是革命事件”并说工作组《二十天情况的报告》是“完全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张承先当场被冲上台的中学生用皮带抽打，并被批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

康生在会上还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康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江青在会上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出他来！”

8月10日 晨，聂元梓到曹轶欧家中，请示批斗陆平的方案。

8月12日 7月29日至今两周内，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来北大串联的约3.6万个单位71.8万多人次。今天一天就接待四千多个单位，十三万八千多人。

8月13日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并经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同意，北京市委驻北大工作组全体人员于今天撤离北大，集中到市委党校整训。

8月14日 康生办公室向聂元梓传达关于批斗陆平的“指示”：“斗争会要开好，对全国有影响，发言要以《十六条》为纲”。

8月15日 聂元梓校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负责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

8月17日 毛泽东主席题《新北大》三个字。

▲在工作队整训领导小组会上转达吴德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张承先可以和工作队一块出来（出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市委有错误，但不要过多责备市委，也不要过多责备工作组。”

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 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各系级、各单位“红卫兵”相继成立，并建立了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22日 校文革筹委会主办的《新北大》创刊号发刊，用毛主席写的“新北大”三字作为刊头。

▲中国科学院供应科职工家属吴素珍，女，60岁，住北大东门外沟沿8号，被路过的北大附中学生揪斗后，又带到附中校内频繁打斗致死。

8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要经过大斗争、大批判、大改革”，“把每个学校、每个单位都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堡垒”。

8月26日 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英语系二级教授俞大纲，女，在“六一八”乱斗事件中，被揪到“斗鬼台”，强令跪下批斗，俞不堪凌辱，情绪低沉。后又被强迫辞掉保姆（俞的丈夫曾昭抡也在外地受迫害），24日又被抄家，于25日服毒，经抢救无效，在今晨零点五分去世。时年61岁。

8月27日 北京市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北大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司令部。江青、谢富治等到会讲话支持。

▲科学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揪至学校打死。

8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说：“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社论还对红卫兵“扫四旧”、“抄家”、“揪斗”、“没收财产”、“游街示众”等行为进行赞扬，说：“这是红卫兵的功勋。”

▲人大附中红卫兵到我校承泽园“造反”，我校职员家属，曾任国民党副军长、1964年批准保外就医的孔海琨被刺破右额，并被拴在树上，折磨致死。时年72岁。

8月30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聂元梓致开幕词。她说大会的任务是：（一）确定今后战斗任务，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摧毁旧的教育制度。

（二）主持选举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校文革常务委员会和正副主任。她说：“革命要靠自己，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大会提出“选举权只能属于人民”，“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及“一切牛鬼蛇神”一律剥夺选举权。

8月 北大附中红卫兵从社会上抓来一个老太太，说她是“地主婆”，被频繁打斗而死。最后也不知姓名，也无家属认领遗体。

9月

9月2日 北大党委委员、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打成黑帮分子，遭到残酷的斗争，服毒身亡。时年38岁。

▲《新北大》报道：自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内到北大串连的外地人员共约212.4万多人次。

9月5日 校文革筹委会发布《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专题斗与系统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相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相结合等。

9月9日 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2个正式委员、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9月11日 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名单如下：

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孔繁、聂孟民、杨学祺、白晨曦。

常委会委员：冯迎玺、戴新民、段心济、廖淑明、徐运朴、刘宗义、刘国政、牛占文、唐景春。

▲经济系五年级学生杨明爱、团员、“文化大革命”初被当做反动学生批判，有7个学生贴大字报，规定不许他私自离开宿舍、退出生活补助等八条。杨感到绝望，留下绝命书外出，上吊自杀身亡。时年29岁。

9月20日 晚上，全校在“五四”广场批斗陆平、彭珮云。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乔·希尔来校参观。

9月21日 北大红卫兵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聂元梓指定孙蓬一等为负责人。21日《会议通报》宣布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代行北大红卫兵统一组织的领导职权；接管北大红卫兵联络站的工作；建议统一后的名称定为《北京大学红卫兵》或《新北大红卫兵》等。

9月22日 《新北大》发表孔繁题为《陆平黑帮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的批判文章。文章给北大党委定了四大“罪状”：（一）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二）陆平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三）“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四）“反动堡垒的根子”。

9月26日 日本松山芭蕾舞代表团在团长清水正夫率领下，来校参观。

9月27日 《新北大》刊登北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关于红卫兵统一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说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五点决定是错误的”，保留抨击的权利。

▲校文革召开系文革办公室主任会议，宣布校文革组织机构。机构分两摊：

（一）管运动的机构：毛主席著作学习宣传组、政策研究组、作战组、组织组、宣传组、大字报组、办公室、革命串联接待组、展览会工作组、国庆游行指挥部、外宾接待办公室；

（二）行政工作委员会：主任白晨曦，副主任段心济、巩运明。

10月

10月3日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纳·桑穆加塔桑来校访问。

10月6日 凌晨，哲学系三级教授沈迺璋在家服毒身亡，时年55岁。生前，沈曾被批斗、抄家、打骂、侮辱。

▲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说聂上台“没有干几件好事”，劝其“自动退位，当普通积极分子，对革命，对本人不无好处”。

10月7日 校文革发表《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大辩论》的决定。

10月8日 《新北大》刊发《欢呼这场大辩论》的社论。提出就校文革执行了什么样的路线“是非”开展路线大辩论。同期发表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种是肯定校文革的，一种则认为“校文革压制群众，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新北大》刊登杨勋的文章《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处于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8月5日的广播讲话》。

10月9日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11月加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10月13日 《新北大》刊登校文革常委廖淑明、杨学祺12日贴出的《整常委的风》的大字报。

10月14日 新北大“六一”战斗队贴出题为《北大要大分裂——北大就是要两个以上的校文革委员会》的大字报。

10月15日 校文革不完全统计，自8月18日至今，全校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共约92个，参加者约三千余人。其中较大的组织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等。“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有的外籍专家也被抄家）。红卫兵还以反“四旧”的名义，将临湖轩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等等。俄语系也一度改名为“反修系”。

▲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简称红联军）成立。

10月16日 晚，聂元梓做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

10月18日 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9月初至今天校内各种人员外出串联者达五千人以上，并在各地建立了造反联络站。

10月20—21日 校文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常委首先要整风”。聂元梓主张“要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辩论进行到底”。孔繁等多个常委则表示要外出串联，“不参加整风”。校文革常委内部两派矛盾表面化。

会上估计，大部分师生均已外出串联，在校各种人员剩下约三四千人。

10月24日 在校文革常委会上，聂元梓提议：因五个常委外出串联，经部分常委研究，提名陈影、姜同光、侯汉清、孙蓬一、王海忱等参加常委会议，加强常委集体领导。会议同意聂元梓的意见。聂还决定由孙蓬一管全校的运动、组织和作战。

10月28日 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将被他们划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区太平庄统一监督劳改。

10月29日 校文革召开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新北大》刊登哲学系一战斗队写的《李雪峰在5月25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等批判文章。

10月31日 校文革决定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

10月 从校文革筹委会时期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造反派组织。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斗争。10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和聂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在“老左派”内部矛盾加剧的同时，北大各造反派组织也发生了分化，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造反组织。一派以“红旗兵团”等造反组织为代表，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一派以“井冈山”、“红联军”等造反组织为代表，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两派在10月份互相采取了一些砸、抄、抓的行动，摩擦日益加剧。

11月

11月1日 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日）五周年，继续批判李雪峰。聂元梓在会上建议将“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

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六个组织也举行了“纪念六一”五周年群众大会。着重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发表倡议书，号召批判聂元梓、校文革的这条“反动路线”。

11月6日 孙蓬一派人带领红旗兵团二十多人到上海揪斗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

11月7日 校文革常委会决定，在广州、昆明、上海、南昌、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建立七个北京大学串联联络站。每站拨活动费500元，粮票500斤。

11月8日 本月初，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开始商量起草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今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井冈山红卫兵建立广播站。

11月11日 新北大上海造反大队在《革命串连报》上发表题为《向上海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上海市市长），揪出杨西光，罢免杨永真，抓住陈琳瑚，打倒常溪萍，气死保皇派》的文章。

11月12日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等五个造反组织砸抄了《新北大》编辑部，同时贴出《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编辑部》的大字报。它说：“《新北大》登出的聂元梓纪念‘六一’五周年讲话是‘伪造品’，删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言辞，充当了聂元梓执行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同）的遮羞布。”

11月13日 晚9时许，中央文革王任重给聂元梓打电话说：江青很关心你，很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今晚让你离开家，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一个地方去。聂元梓

当晚就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派车接到花园街中央文革记者站住。（樊注：应是王力让王广宇去车接聂元梓）

11月16日 江青召集陈伯达、姚文元、王力等在她的住处策划派聂元梓到上海造反。江青说：“叫聂元梓到上海去一趟……再从北京选一些左派去，支持上海造反派，造成造反派的的优势，冲破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统治”。

▲晚，江青找聂元梓密谈，江说：“王任重是国民党派来的”（王当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分管大专院校），“你不要追随他”。又说：“你到上海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上海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曹（获秋）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指示一贯采取抵制态度”。还说“张春桥和陈、曹是有斗争的”，“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都是一窝黑帮”，“他们互相是有联系的，和邓小平也是有联系的……”。聂说，江青还举北大社教“煽动我对彭真、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获秋、常溪萍的不满”，我就“怀着满腔激情决定立即到上海去串联。”

11月17日 王力找聂元梓谈话，根据江青谈话精神，对聂作了具体安排：到上海和中央文革记者站甄××建立联系，有什么材料也送甄××，有什么问题要请示中央文革也经过他。

11月18日 上午，聂元梓从花园街中央文革记者站回校，召开校文革常委会，传达江青讲话要点，又把王力讲话向跟随她一起去上海的孙蓬一等人作了传达。当天晚上即上了火车去上海。“我们商量的办法是：一、通过和上海华东师大联合批判常溪萍（注：常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北大社教中曾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坚决抵制队党委书记的极左作法，并向总书记邓小平揭发队党委书记的错误），打开缺口，揭发批判曹获秋（上海市长）。二、通过上海师大与上海市各群众组织联系，积极参加各种批判大会和活动，亮明我们的观点：上海问题严重。文化大革命前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应该打倒曹获秋。三、把北大在上海串联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他们，在上海串联中进行宣传。”

11月19日 聂元梓按江青的授意，带领孙蓬一等人于当日到达上海，住华东师大。当晚聂召开北大在沪串连人员会议。他们宣布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计划。他们还计划把常溪萍同志打成“北大社教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进行批斗、迫害。聂说：中央文革派我来上海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组织发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央解决上海问题作调查研究。上海市委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动堡垒。并提出将红旗兵团在沪串连人员组成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1月21日 《新北大》登出红旗兵团的大字报——《最严厉谴责新北大红联军、井冈山红卫兵等捣毁＜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的暴行》，并说要掀幕后策划者。

▲聂元梓带领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员三十多人围攻上海市长曹获秋，质问他为什么保常溪萍。说曹是保皇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中文系64届学生陈树崢，团员，在校文革选举中，有人说他是富农出身，剥夺了他的选举权，并对他有所指责，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他思想恐惧，由32楼4层跳楼身亡，时年23岁。

▲上海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开会欢迎聂元梓，聂在会上发言说：“上海市委是反动堡垒，烂掉了”、“常溪萍是大叛徒”，“曹荻秋、陈丕显是刘、邓的人，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上海市委的反符合斗争大方向”。

1 1月22日 聂元梓等经过几天串联后，参加“上三司”的成立大会，会上批斗上海市领导人曹荻秋、杨西光及聂元梓要求增加的常溪萍等。大会给聂元梓、孙蓬一佩戴纪念章，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言，基调是“打倒曹荻秋”。大会上给常溪萍挂了牌子，会后给剃了阴阳头。

1 1月23日 聂元梓到南京参加六省一市的万人大会，煽动群众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 1月24日 上海市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攻击曹荻秋等上海领导同志。聂并宣布：“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此后上海市群众才普遍提“打倒曹荻秋”的口号。

1 1月25日 上海市各造反派组织召开全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大会，聂和孙蓬一、李醒尘商量好内容，由李醒尘在大会上发言，内容同24日聂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样，攻击上海市委和曹荻秋等领导同志。

1 1月27日 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聂元梓一到上海即向中央文革记者站甄××表示：张春桥如来上海，我想同他谈谈。27日甄××去车接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张春桥说：“上海工人是发动起来了，学生运动不行，希望你们起到很好的作用”。当聂汇报在群众大会上她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时，张春桥说：“对，应该这么提，是时候了”，并对北大与上海师大联合批判常溪萍很满意。张说：“常溪萍受曹荻秋重用”。还说：“许多人只知道曹荻秋的问题，不知道陈丕显的问题，其实市委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陈丕显决定的，上海市委的问题要揭透，必须把陈丕显的问题提出来。不要以为陈丕显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许多老革命不是也修了吗？陈丕显已经腐化了，修了”。（聂元梓回来后，把张春桥的讲话，立即向孙蓬一等作了传达。聂、孙等根据张春桥指示，不但重申了“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的誓言”，还提出“揭发批判曹荻秋的后台——陈丕显”。他们还按照张春桥的旨意，选了有影响的四个工厂并和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商量，“如何联合起来，批判曹荻秋，造上海市委的反”。聂还向市委要了一辆宣传车，在大街上到处宣传江青、张春桥的谈话精神，攻击诬陷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发动了批判、颠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新高潮”。）

1 2月

1 2月12日 红旗兵团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和在我校居住的杨炳章（经济系教师杨勋之弟），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1 2月16日 聂元梓离沪回校。她在沪期间曾召集“上海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要他们“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她还鼓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打进市委机关去”。聂离沪时，留下孙蓬一等人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造反活动。

▲聂元梓回到北京，向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作了汇报。张春桥等人认为“聂元梓实现了江青的布置，巩固和扩大了安亭事件的成果，冲破了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统治，造成了王洪文这一派造反派的优势……”。

1 2 月 1 8 日 聂元梓回京前与孙蓬一策划了继续“打常”的问题，1 8 日孙蓬一在上海市文化广场斗争常溪萍大会上，诬陷常“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常溪萍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和人身侮辱。

1 2 月 1 9 — 2 1 日 聂元梓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口号下，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从 1 2 月 1 9 日至 2 1 日，红旗兵团等组织日夜开会，批斗“井”、“红”成员杨炳章、乔兼武。

1 2 月 2 3 日 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联军。

1 2 月 2 3 — 2 4 日 2 3 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 6 年零 9 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2 4 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半版以五行通栏大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报道。第二行通栏黑体字为《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副标题为“科学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 6 年多的艰苦工作，为我国夺得这项理论科学研究的‘世界冠军’”。头版下方是社论，特号黑体大标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

1 2 月 2 4 日 《新北大》刊登校文革常委会的号召书：《号召全体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号召书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历史系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文革”初期多次被批斗，并被集中到太平庄劳改。他因病重得不到及时治疗，至尿毒症很严重时，才送医院，含冤去世。时年 6 6 岁。

1 2 月 2 7 日 留沪继续造反的孙蓬一与华东师大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进驻上海市委，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大武斗——康平路事件，写了《陈（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曹（曹荻秋，上海市长）六大罪状》的大字报。

▲聂元梓控制的北大红卫兵与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等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孙蓬一在上海组织并带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兵团”进驻中共上海市委。该兵团炮制出《刘记陈、曹六大罪状》的材料、四处张贴、散发，攻击、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 2 月 2 9 日 校文革与中央党校、中宣部等四单位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大会。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等人被揪上台“示众”。

1 2 月 康生针对校内有人反对校文革、聂元梓实行高压政策的情况，说：“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江青也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

下半年 大多数单位先后成立了“劳改队”，由监管人员监督劳动，并频繁进行抄家、批斗。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